

[书评]

以明确的问题意识推陈出新

朴镇希, <<韩日会谈-第一共和国的对日政策及韩日会谈的展开过程>>

(Seonin, 2008)

辛珠柏 (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 HK 研究教授)

1. 研究史脉络

在韩日关系研究中, 不可缺少的主题是围绕日本侵略与统治的问题, 以及长达 14 年的韩日会谈。本人虽未做过具体的统计, 但从个人经验来看, 在有关韩日关系史的诸多论文, 特别是博士论文中, 主题主要集中于上述领域。

自 1990 年代开始出现有关韩日会谈的博士论文, 因为能够查阅美国资料, 所以可在韩美日三国的结构性关系中研究韩日会谈。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李元德的著作, 他的研究对象是以‘日本’为焦点开始韩日会谈到签署协定为止这一全过程¹。另外, 李钟元虽未对韩日会谈本身做以详细分析, 但他将这一问题与美国的地区统合战略相关联, 关注 1950 年代韩美日关系²。他注意到 1950 年代是进入 1960 年代的过渡期, 因而打破了 1950 年代是停滞期这一不够明确的成见。

如果说上述两位作者是关注特定时期的结构层面, 叙述整体结果的话, 那么进入 2000 年代以来, 开始出现关注韩日会谈个别议题的博士论文。其中太田修的研究分析了请求权交涉所具有的政治性³, 他将冷战体制、分裂体制及政治逻辑相关联, 对请求权问题进行分析, 他认为李承晚政权是将反日和反共相结合。

但是本人认为, 无论是关注日本行动的李元德的研究还是关注李承晚政权在请求权交涉过程中的政治性的太田修的研究都未能深入分析李承晚和韩国政府的对日政策, 也就是说未注意到作为政策主体的‘韩国政府’。因此, 上述研究对李承晚是如何将反日作为国内政治手段, 以及李承晚政府的对日政策缺乏充分的分析。

2. 研究目的

作者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在韩日会谈方面, 关注韩国政府这一政策主体, 对 1950 年代韩日会谈和韩日关系进行分析”(15 页)。同时, 按照韩日会谈的经过, 以各时期焦点问题为中心, 确立本人的研究计划。以下目录即是上述构想的具体体现。

¹ 李元德, 《韩日过去史处理的原点》, 首尔大学出版部, 1996

² 李钟元, 《東アジア冷戦と韓米日関係》,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6

³ 太田修, 《日韓交渉: 請求権問題の研究》, クレイン, 2003

- I. 序言
- II. 政府成立后的对日政策（1948~1951）：参加对日讲和的问题
 - 1. 韩国的对日认识及政策方向
 - 2. 韩国参加对日讲和会议的要求及挫折
- III. 第 1~3 次韩日会谈及对日政策（1951~1953）：和平线·韩日渔业争端·请求权争议
 - 1. 举办韩日预备会谈
 - 2. 和平线的宣布与韩日渔业争端
 - 3. 请求权争议与韩日会谈决裂
- IV. 韩日会谈的僵局及重开交涉（1953~1957）：释放被扣留者的争议
 - 1. 韩日会谈重开交涉
 - 2. 被扣留者的相互释放及在韩日协议书上签字
- V. 第 4 次韩日会谈的重开及中断（1958~1960）：旅日朝鲜人的朝鲜遣返问题
 - 1. 韩日会谈的重开
 - 2. 旅日朝鲜人的朝鲜遣返及韩日会谈的中断
- VI. 第 1 共和国对日政策的特征及局限
 - 1. 对日政策的特征
 - 2. 對日政策的局限及遗产
- VII. 结束语

事实上，站在‘韩国’的立场对韩日会谈的过程加以重新架构这设想本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许有人会认为与先前的研究相比缺乏新内容。然而作者关注李承晚政府的韩日会谈，明确主张对历史认识的差异导致韩日会谈长期反复的‘难产’，而并非由于对经济理解的差异或是军事外交方面的摩擦。

如果只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对韩日会谈稍有了解者将对研究目的失去兴趣，因为众所周知韩日对历史认识的差异是造成韩日外交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也就是说应注意到前总统李承晚的历史认识对韩日会谈产生的影响，而并非单纯地认识到历史认识的差异，重要的是以历史认识为中心，对韩日会谈进行具体分析。

上述观点有望分析出韩日会谈的根本特征与局限。此外，还能够说明 1950 年代“虽已提交大部分有关韩日会谈争论焦点的妥协方案，却未签署韩日协定的原因”，以及遗留至今的韩日关系焦点问题（17 页）。换句话说，能够导出李承晚政府未签署的协定为何到朴正熙政府时期得以签订的原因和意义。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作者提出的研究目的，那么将对韩国现代史产生新的认识。首先，在李承晚政府时期也实行了反映民族要求的反日政策。其次，如果接受这一点，则难以将韩国的对日政策看作是韩美关系或美日关系的下级层次或决策实施者。第三，李承晚政府由于与日本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只在有限的层面加以讨论，应该更正“由于李承晚的单一反日政策而未能签署协定”这一点。从而得出结论，即使在 1950 年代，那一充满战争创伤与灾害的

年代，也并非只是存在动物般的生存本能。这一新的认识不能评价为简单、次要的研究成果。

3. 研究成果与意义

根据作者的研究，李承晚政府在对日本历史的反省为基础清算韩日历史问题方面，设定了对日问题的基本目标和大前提⁴。那是听取国民的对日赔偿要求等强烈的民族要求的结果。因此，李承晚政府认为“日本对历史的反省不能仅仅停留于单纯的宣言或声明”，在韩日会谈过程中注意到“对日赔偿要求、签署渔业协定、保障旅日朝鲜人的地位”。然而，日本则认为支配本身是正当的，他们只关注旅日朝鲜人的问题，对其他事项漠不关心，韩日会谈之所以进行14年之久，原因就在其中。

促进韩日会谈的李承晚政府的对日政策十分明确，其中的推动力来源于李承晚的对日认识和领导才能，在这一过程中，总管外交事务的外务部未能发挥职能，当时的情况难以采用‘体系’这一概念。

所以，产生了李承晚似乎‘感情用事’的反日意识导致韩日会谈停滞不前的误解，然而这并不是事实。具有民族运动家经历的李承晚比任何人的反日意识都要强烈，他的反日意识与反共政策相联系，在调整对美关系的同时，被运用为“强有力的对日牵制策略”。这成为非‘感情’和‘固执’的维持政策一贯性的支柱。

笔者认为，作者将韩日会谈中‘韩国’这一主体与历史认识相关联，成功论证了历史认识的差异在韩日会谈时期成为两国政府间引发争论的根本原因。同时明确指出李承晚的对日政策源于其鲜明的民族意识，并得到促进。这一点为改变1950年代的时代形象提供重要的依据。其中的分析可运用于对李承晚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善意形象的历史论据。

4. 遗憾

作者的问题意识十分明确，但有些部分缺乏足够的实证，留下如下几点遗憾。

首先是作者批判性的分析方式，作者认为日本政府主张对韩请求权，试图削弱对日请求权，在将侵略和支配作为国际法上正当部分这一方面，有必要考虑到美国的态度。美国虽然清楚日本的主张毫无根据，但单靠不支持日本的立场这一说明是不够的。因为在历史正当性或普遍价值这一层面来看，美国和日本均采取了帝国主义的态度。为解决持续至今的日本历史认识问题，有必要提出韩国应对美国采取何种态度这一具有反思意识的结论。采用上述方式有望在韩国现代史中将美国的意义加以客观化，同时在今后东亚历史矛盾中能够批判性的分析美国的作用，并将其作为历史材料使用。

其次，作为韩日会谈的主体，‘韩国政府’未充分显露出来。作者也指出，在1950年代的韩日会谈中，李承晚直接参与其中，选出韩国政府代表，

⁴ 从“VI. 第1共和国对日政策的特征及局限”可了解到其内容。

提出政策方向，甚至不通过外务部而是直接听取和整理相关情报，因此，缺乏组织性的支撑。然而有必要推究韩国政府采取何种态度，韩国政府内部在举行会谈时，有关人士围绕具体问题提出何种主张、由此产生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上述问题与总统之间的关系。

此外，有必要分析‘韩国人’这一主体的各种行动，并非单纯停留于直接参与会谈或与会谈有关人士的具体行动。例如，根据本人近期研究发现，在第 1~3 次韩日会谈中，韩日间的历史认识差异明显的暴露出现，从和平线问题导致韩日紧张加剧之时起，有关独岛的学术研究也同时进行。有关间岛的论文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一对外环境和研究现状反映于第 1 期教育课程发行的教科书中，并实施对独岛和间岛的教育。

最后有必要在政策制定的延续性过程中具体分析长期进行的韩日会谈和国内政治的关系。作者也在文中“分析了对历史认识的差异遇到现实政治这一变数，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发生矛盾并加以调整的过程”（365 页），然而笔者认为作者的实证不够充分。当时国会议员和知识分子也像李承晚一样对日本具有强烈的不信任和对抗意识。然而，李承晚的对日政策与国内政治相关联，则与此对应的局面将产生一定的偏差。李承晚的对日政策在通过宪法修改对延长政权起到何种作用也是应当关注的部分。

每个人的人生是如此，更何况十几年间围绕国家间外交关系而产生的总统、官员、政治界人士及国民的曲折呢？我们有必要分析围绕和平线问题、旅日朝鲜人的北送问题、日本人人质遣返问题及对韩请求权问题而产生的各种利害关系方之间的政治关系。只有这样，在阐明特定问题时，历史论文将更具时代意义。